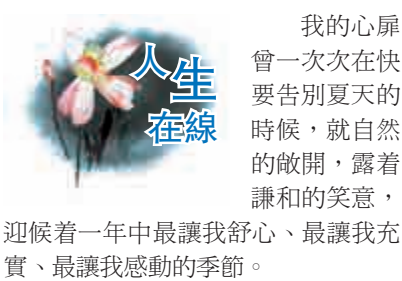


心門外的秋天

五月牛



我的心扉曾一次次在快要告別夏天的時候，就自然的敞開，露着謙和的笑意，迎候着一年中最讓我舒心、最讓我充實、最讓我感動的季節。

秋天給我的舒心，本是大自然所給予人類的恩賜。夏日裏那種想來就來，想去就去的低氣壓幾乎讓人的心房無法包裹。秋高氣爽，夏日裏殘留於內心的壓抑與惆悵頓時蕩然無存。

秋天給我的充實，亦是大自然對人類的惠予。當果實掛滿枝頭，精神的收穫更是讓思想着的你我倍感慰藉。

秋天給我的感動，永遠是大自然賦予人類的厚禮。在這將酷暑與嚴寒交接和分割的時空裏，呼吸是感動的，收穫是感動的，成功是感動的，人們的笑容更是感動的。

秋天讓我們無法拒絕，秋天讓我們充滿期盼，秋天給我們豐富聯想，秋天總叫我們不忍割捨。

然而，就在我向着半百人生跋涉的某一年，我突然厭惡秋天，我突然害怕秋天，我突然憎恨秋天，因為秋天其實並非是我天真想像中的那般清純完美，她的美麗甚至讓我覺得醜陋，她的富裕甚至讓我覺得庸俗，她的感動甚至讓我毛骨悚然。這一切都是人生的一次次嘗試，一次次酸苦，一次次苦難所給予的覺醒。我的靈魂有了另一種叛逆的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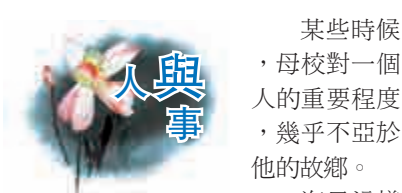
秋天的氣息是虛偽的。秋天不冷不熱，幾乎讓人在這種似乎沒有個性的氣候空間裏，失去了對付炎熱與寒冷的警惕，人類生命對自然抵抗能力的淪喪也是禍起於秋天。秋天掩而不露的詭秘，薰陶了人類中那些善於見風使舵和笑裏藏刀者的詭計，而

.....

.....

不回母校

李貴平



某些時候，母校對一個人的重要程度，幾乎不亞於他的故鄉。

海子這樣寫過：「我要還家，我要轉回故鄉。我要在故鄉的天空下，沉默寡言或大聲談吐。」

當年就讀於重慶師範大學，就是沉睡在我心底的精神故鄉，曾經，它在我人生長河中激盪起太多的漣漪——關於青春的夢囈，關於性情的重塑，關於閱讀的思索，關於對人文世界的回望……

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大學被我淡出了視線。不是「數典忘祖」，而是離校三十多年因瑣碎事務變得迷亂的心，幾乎沒有盛容她的地方；或者說，我不希望俗世事務與美麗的母校同處一「室」，就像公園裏堆砌的假山沒有資格和巍峨的歌樂山比肩。

我知道有個比喻也許很蹩腳：在流星般的中外影視明星中，我最迷戀的是柯德利夏萍（Audrey Hepburn，內地譯：奧黛麗·赫本），準確說是《金枝玉葉》（Roman Holiday，內地譯：《羅馬假日》）裏的安妮公主。夏萍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銀幕形象，一直牢牢地存活我心，如瑩亮的月光讓一個人的靈魂在那麼長時間自得其樂地清淨澄澈。

而今天，我心目中與柯德利夏萍有關的大學校園漸行漸遠了。遠去了的，不只是那所大學的外部形態：月影中蛙聲歡叫螭螭鳴叫的荷塘，陽光下鳥兒穿梭的青石板階梯，「第二校園」沙坪公園藏在草叢的布穀鳥、畫眉、蜜蜂和蕨菜；也不只是校園裏那些溫馨的人事——課堂上以詩解詩的古典文學副教授，圖書館裏拿徐志摩詩集青澀示愛的男生女生……消失了的，更是屬於那個年代的純真氛圍。

如今，倘若你去沙坪壩重師看看，那林立的商舖，喧囂的車輛，耀眼的幕牆，繁雜的看板，讓你不得不驚嘆，這世界變化太大了，這現代拆遷改造的效率太可怕了，一夜之間，來不及告別，一座母校的記憶被驅趕得一乾二淨。於是，從七年前我穿過熙熙攘攘的三峽廣場好不容易找到校園故地，我就一聲嘆息，今天的「重師」與我還有多少關係？我回母校還能

人類中有些愛恨分明的棱角凸現者也許正是夭折在秋天的陰險裏。

秋天的果實是世俗的。色彩鮮艷的秋果讓人垂涎欲滴，幾乎調動起潛伏在人們骨子裏的所有貪欲。多少人在無法抵擋的誘惑中，被某種看似鮮艷實質有毒的果實害死，多少人在累累果實的爭奪中打得頭破血流。「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雖已成為人所皆知的至理名言，但奔湧的物欲卻並未因此枯竭。今天，當物欲的濁流越發的將暴富與貧窮分開時，富人們為了從泛起的沙礫裏淘取更多的金子，而甩開那標榜着紳士風度的極品洋裝，瘋狂的衝進欲望的洪流；窮人們為了能從奔湧的流水裏捕得幾條暫且充飢的小魚，而不惜拋卻那本可遮體的破衣，拚命的追逐着濁流中那隱約可見的生命。

秋天的感動是傷心的。幸福讓人感動。當盛滿了感動的秋天像一隻大籃子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誰能說裏面沒有苦澀，沒有傷感，沒有遺憾麼？當一副副感動的面孔毫無規則的呈現在我們面前時，怎能分得清誰是因夢想成真而感動？誰是因飛黃騰達而感動？誰是因受人惠澤而感動？誰是因失意潦倒而感動？

真正的認識了秋天，讓我感到追悔莫及，因為我生命的大半時光已經消耗在那種本無意義的感動裏。我唯一的反應是心房裏那扇大門的自動關閉。

把秋天關在心房的門外吧，也許有一天又會有無限的自責，也許哪一天又會有永遠不可彌補的缺憾，但那時我思想的繮繩或許早已被掙斷了，一顆浸透了人間矛盾的心又實實在在的扎根於秋天的思考。我想，這也許便是造物主既創造了一年四季的秋天，又創造了易於反思與叛逆的人類時所預料到的。

.....

.....

不回母校

李貴平

看到些什麼？屬於我的那塊淨土究竟在哪裏？

是的，一座美麗的鏡像被打碎了，碾成粉，早已從另一副模具裏脫胎出來，它們身著統一制服的克隆軍團，成了一個時代的集體分泌物。如果說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只能指認和珍藏一個母校，那麼，面對變本加厲千篇一律的改造，我們還有使用「母校」一詞的勇氣和依據嗎？我們還有懷想追夢的心靈基礎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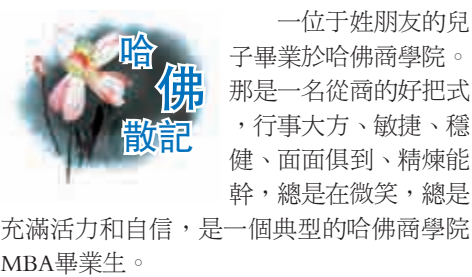
不只是校園的那些人那些事，我們身邊的一切，都彷彿被瘴雲山濃霧籠罩着很難看清真實面目，又宛如今天聒噪的流行音樂，早已蓋過優美的青春校園歌曲，它不停催生人們前仆後繼熱血賁張的洶金夢。朝雲暮雨的人間萬象，怕連最富想像力的「星空哲學家」康德也難以想到。

當年的大學同窗，也猶如滔滔嘉陵江裏的紛亂石頭，經過九曲縈迴千沖萬磨，當然沒了原來的形象輪廓。這些年，多少次同窗聚會都讓我驚詫，許多人就像是夢中故事的某個主角，其現實處境反差之大，讓我一度想到魯迅先生筆下的「我」和閨土。

三十年，盡可以當作是一個古老滄桑的傳說，彷彿有個聲音，如同久石讓的《風之谷》旋律，如泣如訴，讓聽者在沉吟中莫名憂傷。

不過，我畢竟也深深牽着我的校園，即使這當兒我也懷疑，「不回母校」不是一個偽命題。《月黑高飛》（The Shawshank Redemption，內地譯：《肖申克的救贖》）有句話：「雖然我們沒有翅膀，但我們不能放棄飛翔的夢想。」就我個人來說，步履不回母校，並不真正代表我的心魂沒有重回校園。記憶中，那所大學厚德寬鬆的人文環境，第一次頤養了我的情性並影響我的人生觀——我對歐美文學和唐代邊塞詩歌的入迷，對山川風物的青睞，對歷史遺存的敬畏，對「白天有鮮花，晚上有月光」人生境界的崇尚，都源於大山城那所高校園的滋養。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每個人都有「致青春」的心路歷程。我寧願相信，我的校園沒變，永遠也不會變，即使她身處鬧市深陷喧囂，那斑駁密仄的綠蔭總時時驅使我們心靈的步履重返故地，追尋屬於那一代人的希冀美景。



一位于姓朋友的兒子畢業於哈佛商學院。那是一名從商的好把式，行事大方、敏捷、穩健、面面俱到、精煉能幹，總是在微笑，總是充滿活力和自信，是一個典型的哈佛商學院MBA畢業生。

這個年輕人本科畢業於密西根州立大學，畢業後在戴爾公司工作兩年，之後就讀哈佛商學院。

在我看來，哈佛錄取他的理由，除了優異的學業成績，更多的是他具有從事商業活動的潛能，以及在戴爾公司工作時的出色表現。從哈佛畢業後，他應聘於國際大公司，包括出任聯想公司總裁的助理。

哈佛商學院的校舍獨成一體，隔着查爾斯河，與哈佛主校區呼應。城堡似的建築，加上新英格蘭風格的院落，紅牆、白窗、青瓦，校舍神秘莊重，古樸典雅。建立於一百多年前的哈佛商學院，旨在培養一批工商界的高級管理人士，一批能在工商界獨當一面的領軍人。兩年的課程，圍繞這個目標而設

.....

.....

先賢祠——法國精英安息地

高秋福



和承繼精神的歷史精英，有一個去處是決不可忽略的，那就是法蘭西歷史名人靈魂的安息地：先賢祠。

先賢祠位於市中心拉丁區的一塊高地上，大體上是坐北朝南，俯瞰巴黎全城。整個建築的平面呈十字形，長一百一十米，寬八十四米。四翼是低矮的殿堂，中央聳立着一個高大的穹窿狀圓頂。圓頂實為一座三層塔樓，高八十三米，塔尖直插藍天，寓意天人相接。建築正面的大門口，矗立着二十二根十九米高的科林斯式圓柱，形成一個氣勢雄偉的柱廊。柱廊上方是一道三角形門楣，上面有女神站在中央向兩邊的文臣武将散發枝枝花環的浮雕。門楣下方鐫刻着六個法文大字：對偉人，國感念。這些字刻於一七九三年，是這座建築的點睛之筆，表示這裏安息着法國國家與民族永遠緬懷的歷史先賢。

這座歷史先賢的陵寢，原是一座破敗的教堂。據記載，一七四四年，國王路易十五染病，祈求巴黎聖女熱內維耶芙（Sainte Genevieve）的庇佑。他鄭重許諾，病愈後定將重建這座教堂，作為她永久的棲息地。不久，這位國王病愈，為踐行諾言就下令著名建築師雅克一日梅恩·索弗洛（Jacques-Germain Soufflot）大興土木。索弗洛仿照羅馬的萬神殿（Pantheon）進行設計，工程於一七六四年奠基。後因財政困難，幾經延宕，直到一七八九年才竣工，時稱聖熱內維耶芙教堂。恰在此時，法國大革命爆發，波旁王朝被推翻，路易十五的繼任人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聖熱內維耶芙的金屬棺槨被熔毀，遭骸遭焚燒，骨灰被拋到塞納河裏。從此，逾千年的封建統治結束，資本主義開始確立和發展。一七九一年四月，作為大革命權力機構的制憲會議通過決議，將這座封建帝王修建的教堂世俗化，稍作改裝，變成為國盡忠盡責的名人安葬地，也以「Pantheon」命名。同一個拉丁字，根據建築的不同功用，中文在這裏意譯為「先賢祠」。後來發生波旁王朝復辟，政治風雲變幻，先賢祠又幾次改為教堂。直到一八八五年，大文豪維克多·雨果安葬在這裏，先賢祠作為一座安葬歷史名人的世俗建築才最後確定下來。

踏上先賢祠高大的台階，穿過柱廊，走進寬敞的大廳。大廳仍似教堂，牆壁和穹頂盡是油畫和浮雕，有的描繪宗教故事



計。

哈佛人習慣把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簡稱為B School。有人這樣說：假如把哈佛大學比作全美所有大學中的一頂皇冠，那麼皇冠上那顆璀璨奪目的珠寶，就是哈佛商學院。也有人說：哈佛商學院是孕育全球大型企業掌舵人的搖籃，是商人、主管和總經理的西點軍校，是製造老闆的工廠，是全球富商的鍍金聖地。還有人說：哈佛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是權力與金錢的象徵。是的，那是許多年輕人夢寐以求的學位，美國前五百家大公司裏，五分之一的老總畢業於此。

哈佛商學院的案例教學極負盛名。學院着眼於培養學生的好奇心、創造力、對問題的敏銳力、相互聯繫的記憶力，以及對困難和機遇的自信心和膽量。此外，也着重建立學生既不急功近利，也不優柔寡斷的品格。

哈佛商學院在招生中精挑細選，收生時除了看學生的智力、GMAT成績，還考慮潛在的管理能力和個人氣質，例如語言、數學、推理能力等。面試時，學生剖析自己的入學動機、優點缺點、興趣嗜好、自己的突出

.....

.....

先賢祠——法國精英安息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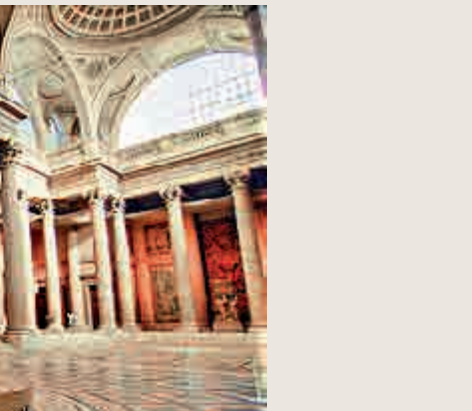
高秋福

，有的描繪法蘭西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顯得莊嚴而肅穆。我無心也無暇將這些一一觀賞，因為最為神往的，是安葬先賢的地宮。從明亮的大廳沿着旋梯走下去，光線驟然變得幽暗，空氣顯得分外凝重，只見一排排黃褐色的石柱挺立，撐起一個縱橫交錯的十字形巷道。巷道前後左右形成四個墓室群，每個墓室群都有黑色的鐵柵緊鎖。其中，左翼的墓室群空蕩蕩的，尚無入葬者。前面和右翼的墓室群雖有入葬者，但也顯得有點寥落。入葬者大多集中在後面的墓室群。有的墓室是一人獨處，有的則是兩人或多人共居。在過去的二百五十多年中，這裏總共安葬過七十二位法蘭西歷史名人。其中，大多安葬的是遺骸或骨灰，少數是裝有心臟的瓷罐，個別是象徵性的空棺或紀念牌。由於政治變化或家屬意願，有的遺骸後來遷出，有的丟失，而今安葬的實際上是七十一人。

什麼人入葬先賢祠，起初沒有特定標準，只是說「對國家和民族作出重要貢獻者」。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入葬者因此幾乎都是大革命中的風雲人物。從一開始到一八一五年六月拿破侖倒台的二十四年中，幾乎每年都有人入葬，最多時一年有七人，前後共有四十九人之多。這是先賢祠歷史上入葬者最多、最集中的時期。其中，參與大革命的軍官二十三人，政治家十五人，都是隨逝隨葬。拿破侖當政的十多年，簡直把入葬先賢祠視為籠絡人心的一種政治手段。

第一位入葬者是奧雷諾·米拉波伯爵（Honoré Gabriel Riqueti de Mirabeau），他是作家、演說家、政治家，以溫和派身份投身大革命，曾任制憲會議議長，被稱為「大革命精神的化身」。一七九一年四月二日，他因病去世，制憲會議先是為他舉行隆重葬禮，隨後將他安葬在竣工尚不到兩年的聖熱內維耶芙教堂。同時決定，這座建築物「今後只接受從我們這個自由時代起始的偉人的遺骸」。這樣，這座教堂就從封建君主旨意中的神殿變成新上台的資產階級的名人陵寢。可是，米拉波伯爵入葬不久，人們發現他生前被國王路易十六重金收買，以「秘密顧問」身份暗中破壞大革命。此情一經揭露，米拉波伯爵即被認定「不配享有國家榮譽」，其遺骸於一七九四年十一月被遷出，安葬在巴黎郊區的一個公共墓地。

緊隨米拉波伯爵入葬的是為法國大革命做了思想準備的著名作家兼哲學家伏爾泰和盧梭。而與盧梭同年入葬先賢祠的是大革命激進派代表人物讓－保羅·馬拉（Jean-Paul Marat），他於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三日遭保守派支持者暗殺，遺體安葬在



成就、取得成就的原因、道德觀念、創造性的思維能力，以及有能力完成兩年學業的健康體魄。學生入學前的實際工作經驗和工作表現也非常重要，以此預測學生畢業後事業成功的可能性。因此哈佛商學院的學生在入校之前，就已經具備相當的營商經驗。

一個哈佛商學院的碩士生，畢業後年薪一開始就在十萬美元以上。由此也有人指責說：哈佛MBA的第一個缺點就是身價太高。是的，從哈佛商學院畢業的人，分分秒秒都在關注各大企業的成長和利潤，他們拚起命來追求利潤和成功，被稱為業界的「職業殺手」。

除了培養企業精英，哈佛商學院也為世界各地培訓政府高級官員，例如香港特區政府前駐京辦主任曹萬泰等。此外，中國人熟悉的第四十三任美國總統喬治·布什（George Bush）、美國第二十四任勞工部長趙小蘭、美國政商兩棲人物彭博（Michael Bloomberg）、香港特區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現任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田北辰等，都是哈佛商學院的畢業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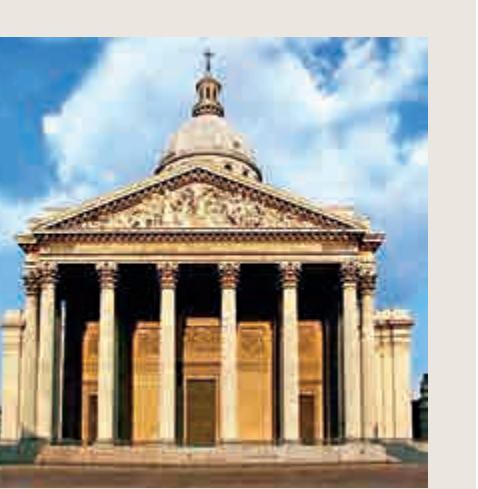
（哈佛散記之二十八，逢星期三刊登）

.....

.....

先賢祠外觀

作者供圖



一個俱樂部的花園中，這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普選產生的國民公會追認他為革命烈士，將其遺骸遷葬先賢祠。不久，政治形勢發生變化，他遭到一些人的詆毀，遺骸又被遷出。

大革命時期政局複雜多變，入葬先賢祠後又發生變故者，還有尼古拉－若塞夫·薄瑞派爾（Nicolas-Joseph Beaurepaire）和奧居斯坦－馬瑞·皮科（Auguste Marie Henri Picot de Dampierre），他們皆為跟反對法國大革命的歐洲封建勢力英勇作戰的英雄，為國捐軀之後，被安葬在先賢祠，但不知何故，他們的遺骸後來竟不翼而飛。另一位是大革命時期著名政治家勒佩萊蒂耶·德·聖－法蘭諾（Louis Michel le Peletier de Saint-Fargeau），曾任國民公會主席，以他決定性的一票通過處死國王路易十六的決議，他於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日被保皇分子暗殺，安葬在先賢祠，可是，不知出於何因，家人一年後將其遺骸遷出。

從一八一五年波旁王朝再度復辟到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初建的六十年，政局動盪不定，入葬先賢祠的只有其設計和監造者索弗洛一人，先賢祠的大門基本關閉。普法戰爭期間，地下墓室變成彈藥庫；內戰期間，大堂則成為巴黎公社的總部。這種局面，直到一八八五年雨果入葬才被打破。

從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的一九三三年，只有十人入葬先賢祠。他們大多並非同時代人物，而是與法國大革命有關的歷史名人。其中，數学家和工程師拉扎爾·卡諾（Lazare Carnot）是大革命的組織者之一，在拿破侖當政時期曾任國防部長；泰奧菲爾－馬洛·克雷（Théophile-Malo Corret）是以勇猛著稱的「傳奇式士兵」，被拿破侖譽為「法軍第一投彈手」；讓－巴蒂斯特·博丹（Jean-Baptiste Baudin）是一位專為窮人治病的醫生，為抵抗拿破侖三世發動政變於一八五一年犧牲，被譽為「共和事業的烈士」；弗朗索瓦·塞弗蘭·馬索－德格拉維耶（François Séverin Marceau-Desgraviers）是大革命時期最年輕的將軍，一七九六年九月在出征普魯士時為掩護友軍而負傷陣亡。其他還有一八九四年六月遭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暗殺的瑪利·弗朗索瓦·薩迪·卡諾（Marie François Sadi Carnot），是先賢祠中第一位、至今也是唯一的一位法蘭西總統。屬於社會黨的哲學家 and 演說家讓·饒勒斯（Jean Jaurès），在遭暗殺十年後，其靈柩於一九二四年由幾十名礦工抬進先賢祠，成為先賢祠中首位著名的社會主義思想家。（上）

.....